

## 国外“体育参与”与“社会分层”关系的 五大理论流派述评

徐茜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 要:** 通过评述国外关于“社会分层”和“体育参与”关系的既有研究文献, 指出“炫耀说”“社会区隔论”“冲突论”“社会流动说”以及“不平等论”,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研究“体育参与”和“社会分层”关系的五大理论流派, 它们对于分析处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也为今后进一步探究“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之间深层关系提供了跨国比较的基础。

**关 键 词:** 体育参与; 社会分层; 炫耀性消费; 区隔理论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09-0031-05

### Review of five overseas mainstream theories about cor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XU 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available overseas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co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ory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eory of Social Distinction”, “Theory of Conflict”,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ory of Inequality” are five mainstream theories for analyzing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erms of sports sociology, and that they provide not only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nalyzing the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ition, but also a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 foundation for probing further into deeper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port particip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ocial distinction

体育社会学作为应用社会学的分支, 长期以来不但极为重视从社会本质上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与途径, 而且也强调透过体育运动的社会结构与特点, 来揭示体育跟社会的动态关系。在体育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领域, 学者对于体育参与方式与社会分层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它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就若干社会现象提供了富于体育社会学色彩的解释视角, 拓宽了人们的认知视野。

体育社会学倾向于将“体育参与”(sports involvement, sports participation)视为现代社会最为常见

的社会现象之一, 并且将其看做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化的途径之一。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sup>[1]</sup>对“体育参与”的社会含义进行了细化, 他认为“体育参与”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 整合了参与者的社会阶层特征。

体育参与方式如何反映参与者职业特征、经济水平与社会声望? 如何按照特定的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区分, 并通过这种区分来强化或者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 笔者试图通过系统梳理体育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之间关系的文献, 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 1 考察“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关系的五大理论流派

从体育社会学的传统观点来看,“体育参与”不仅是围绕如何形塑、锻炼人们身体的社会安排,也是人们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一项“社会化”意义上的制度安排。通过对于人们的“体育参与”倾向的塑造,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阶层、地位、声望以及权力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复制了。纵观国外对于体育参与方式与社会分层模式的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炫耀说”“社会区隔论”“冲突论”“社会流动说”以及“不平等论”是学者们用来研究“体育参与”与“社会分层”关系的 5 大理论流派。

### 1.1 炫耀说

凡伯伦(Thorstien Veblen)<sup>[2]</sup>生动地探讨了 19 世纪体育参与方式与上流社会的生活风格之间的亲和特性。他指出社会上层的体育活动旨在展现其雄厚的经济资本与崇高的社会声望。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从事手工及生产性劳动会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无需劳动与休闲活动彰显高贵的社会地位。而上流社会甚至认为赋闲不足已显示他们的上层身份,只有通过体育活动消磨时间和花费金钱方能体现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花费不菲的体育运动项目成为上流社会炫耀其社会优越感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体育项目包括赛艇、马术、网球与高尔夫球等。

19 世纪赛艇是一项象征显赫社会地位的运动,当时盛行于泰晤士河畔的赛艇盛会吸纳了伦敦的精英阶层人士。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术成为上流社会的运动标记,有钱的商人也希望通过这项昂贵的运动接近上层社会。高尔夫俱乐部成了生意人的聚集地,不仅因为可以显示贵族身份及显赫的社会地位,还在于高尔夫俱乐部本身就是生意谈判的场所。此外,网球也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运动,原因在于成为一名网球俱乐部会员,特别是诸如温布尔登(Wimbledon)全英网球俱乐部的成员,可以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

考虑到 20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凡伯伦将体育参与方式视为一项炫耀性活动的理论,被作为一种阶级分析开始遭到批评者的质疑。批评者指出了“炫耀说”的局限性,例如,在后工业社会来临时,全民闲暇成为可能的时候,它无法解释体育参与方式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风格各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然而炫耀说对于部分社会现象仍具有解释力,从埃斯科特马会(Ascot Races)俱乐部成员的入会门槛或者在工作日期间打高尔夫仍然能窥见炫耀性消费的遗迹。格朗尼尔(Gruneau)<sup>[3]</sup>指出,凡伯伦的理论对近代体育的发展与阶层判别提供了基线

(baseline)。

### 1.2 社会区隔论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sup>[4]</sup>认为凡伯伦对于上流社会的体育参与方式理解存在偏差。炫耀性消费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上流社会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消耗过剩的精力和过多的金钱,而是因为上层阶级热衷于将自身与社会其它阶层区隔开来。体育参与方式是他们实施这种社会区隔的有效手段之一,这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区隔理论”。区隔说论证了当一种体育项目(例如网球)开始流行时,上层阶级转而寻求新的例如赛艇等其它体育项目,从而将自己与其他阶层相区隔的现象。

体育参与方式作为一种阶层区隔的手段,不仅体现在对体育项目的选择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于体育运动本身所持有的观念上。19 世纪公立学校学生对运动的崇拜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只有运动才能为他们将来进入上流社会奠定基础,是能力的储备阶段。相反,工人阶级被归类教育,成为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当遇到战争威胁时他们还要承担起战士的重任。这个时期,专业运动员与业余运动员之间有着明显的区隔:专业是指从事体育运动最终目的是为了钱,而业余则是为娱乐、地位和其它原因;专业运动员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而业余运动员大多数来自上层阶级。有趣的是,上层阶级往往看不起专业运动员,原因不仅在于专业运动员来自下层,而且“专业运动员因为过度训练以及出众的能力,水平大大超过了业余运动员”<sup>[5]</sup>。

区隔还体现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之间以及同一体育项目内部。上层阶级通过昂贵的消费或者严格的高尔夫、赛艇俱乐部会员制将其它阶级排除在外,而工人阶级则被拳击、摔跤、跑狗等富有刺激性的体育项目吸引。在 20 世纪,体育场并未成为所有阶级统一的场所,社会运动带来体育改革,目的是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体育参与,实施运动计划。同时,尽管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合为一体,胜利至上、粗俗的快乐主义等工人阶级特征还清晰地存在。希林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不同的社会阶层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身体,因而选择相应的体育项目。他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将身体定位为器械,因此他们选择足球、摩托车、拳击等运动项目;相反,统治阶级将身体定位为终极目标,从事的体育项目重在塑造体格、有益健康。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将身体定位为器械同样能塑造体格、有益健康,更何况有许多有钱人也参加诸如摩托车等剧烈的运动项目。

在“阶层区隔说”观点的持有者看来,面对上层阶级有意的区隔性行为时,中下层会试图通过模仿上

层的体育参与模式，打破这种社会区隔。例如，工人阶级的体育也有可能是对中产阶级身份的渴望。

### 1.3 冲突论

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赞同社会区隔论。他们认为社会区隔论忽视了体育运动自身的特质。这些学者注意到了社会下层所推崇的体育项目中的“暴力”与“反社会”特征。例如，19世纪工人阶级的体育价值观——对胜利的偏执、团体性偏见、为赚钱不择手段、对权贵与规则的蔑视、粗俗粗鲁的行为等——与中产阶级奉行的公平竞争及参与优先的运动精神背道而驰。这些学者更倾向于将“体育参与”视为一种表达阶层之间与阶层内部冲突、敌意、对抗的形式或手段，这就形成了冲突论。冲突论学者强调自19世纪以来社会力量对于整个体育运动中的“暴力与反社会因素”的规训与控制，即体育运动项目在整个现代社会先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变得更加文明和有规矩。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被逐渐整合进关于体育的研究之中。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规范与社会准则如何影响现代体育运动，即潜在的阶级冲突如何通过体育活动被疏导，从而避免阶层敌意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被劝导放弃混乱的、无组织的体育运动形式，采纳文明的运动方式。但劝说未能奏效，法律随即被引入来平息极端的、混乱的体育暴力行为。19世纪末，工人阶级中有一定声望的经济可靠的上层人物普遍成立了体育俱乐部。哈格里维斯(Hargreaves)<sup>[6]</sup>指出，体育商业化也为工人阶级的体育参与提供了更多机会。例如足球，一项工人阶级热衷的体育项目，以前是暴力及混乱的，而20世纪则变得有组织、有结构。有一些工人阶级成员变成了专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年轻的工人阶级成员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到足球活动中来。

面对统治者借助中产阶级世界的社会规范与准则控制“冲突”的努力，下层阶级也做出了反击。但关于工人阶级能在何种程度上主宰他们自己的体育命运存在着意见分歧。一方面，19世纪有现象表明：中产阶级影响着工人阶级的体育。首先，涉及到大多数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城市工人的道德及行为，对应着各种仁慈的、有信仰的群体建立足球及板球俱乐部试图对行为进行规范；其次，许多商人投资体育产业以提高适应力和生产力，同时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瑞斯(Riess)<sup>[5]</sup>指出：19世纪晚期卡得巴瑞斯(Cadburys)及容翠(Rowntree)巧克力工厂为男女员工提供基本的体育训练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16岁以下女生可以在给定的时间游泳，在专职健身教练辅导下在公司的健身

房进行身体练习，下班时间她们也被鼓励参加团队体育项目。

学者们还指出下层阶级在20世纪开始有意识地塑造一种不同于中产阶级的体育观念，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将其视为对抗中上层群体的意识形态武器。郝特认为工人阶级慢慢地培养他们自己的传统观念，即坚韧、坚持、忠诚，他们的体育俱乐部与中产阶级遍地开花的方式不同，是由街道甚至是街坊邻居组成的。郝特声称强健的基督教徒及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控制无能为力。这种思路由以下事实支持：19世纪末期的社会运动导致了体育价值观的分裂。社会主义批评家认为体育中的用户至上主义及暴利行为是对工人阶级的又一次剥削；与之相反，主流社会主义者洞察到体育的智力、道德、健康功能，工会组织例如“全国号角自行车俱乐部”用这样的口号宣传体育：传播社会主义，缔结伙伴关系！<sup>[7]</sup>

这种围绕体育参与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哈格李维斯(Hargreaves)<sup>[8]</sup>注意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工人阶级的体育参与有了明显增长。琼斯(Jones)<sup>[9]</sup>也指出，尽管工人阶级的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统治阶级的影响，但在内战期间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态度得以保留和再生。工人阶级体育的重要聚集地是酒馆，体育项目如室内拳击、足球、保龄球都与赌博行为相关联，这种赌博行为被酒店老板发现并成为发财商机开始蔓延。酒馆同时还是传统工人阶级体育项目如钓鱼、信鸽的聚集地，在20世纪30年代每个项目的参与者均超过50万。

### 1.4 社会流动说

从大量的研究材料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在厘定“体育参与”与“社会分层”关系的时候，倾向于将体育参与视作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就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流动说。社会流动可以理解为人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社会流动有两种基本类型：水平流动(horizontal)和垂直流动(vertical)。水平流动意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集团向另一个相同水平的集团的转换。垂直流动是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流动说在现有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社会事实的有力支持。

学者们发现，体育参与作为一项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为时已久。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产阶级热衷于体育，因为他们将体育视为进入上流社会的途径。中产阶级除了帮助工人阶级制定体育规则及驱逐体育暴力之外，他们还将体育塑造成为忠诚、勇敢、强健的基督教徒形象，即通过社会行为规范控制包括同性恋在

内的性冲动。同时,中产阶级还热衷于建立体育俱乐部,因为体育俱乐部象征着地位、身份的高贵,是社交名流的集合地。

从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中产阶级不仅最早意识到体育可以帮助他们向社会上层攀爬,而且也几乎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上模仿上层社会,流露出最为强烈地向上流动的渴望。如果被上层社会的体育俱乐部拒之门外,他们就会成立中产阶级自己的俱乐部,例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网球俱乐部。中产阶级也常常向工人阶级的体育项目渗透。例如,他们不仅自己踢足球,同时还是专业足球俱乐部的股东及经理人。1870至1914年间,上层社会妇女在女子体育中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参与体育的重要意义在于:体育运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方式。尽管妇女参与体育遭到反对,但是网球和自行车运动如同妇女体育运动的灯塔,因为这些运动为妇女提供了家庭以外的娱乐场所。

直到20世纪,西方社会才开始为社会下层群体创造出通过体育参与实现向上流动的客观条件。其后果之一是大批工人阶级的后代成为体育明星,踏上了通往社会上层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成为足球、板球、橄榄球、赛车、职业骑马师等专业运动员来改善生活状况,经济收入发生了变化。19、20世纪之交,一个职业骑马师年收入可达1000英镑,而足球运动员的周薪不超过4英镑,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第二职业。绝大多数足球运动员的职业前景黯淡,处于缺少长期人生保险、工作条件恶劣、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微乎其微的危难之地。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通过成为板球职业球员而赢得经济及社会地位双丰收成为可能。然而,20世纪的大半时期内,板球职业运动仍然由来自公立学校的中产阶级所垄断,工人阶级的机会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职业足球运动成为工人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很明显:大多数职业足球运动员是由铁路工人、小职员、工人居住区的男孩组成。

### 1.5 不平等论

20世纪晚期,英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体育参与作为社会定型化的手段在整个社会中开始被广泛使用,在社会分层过程中扮演了社会不平等制造者的角色。因而形成了第五个理论流派,即“不平等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吉登斯(Giddens)<sup>[10]</sup>曾论述个人的解放是从不平等的限制中挣脱从而获得自由。尽管有些体育项目受到后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影响,体育参与仍然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价格的制约仍然存在,还必须看到其它社会障碍。有些俱乐部设置门槛,令一些阶层成员参与

体育项目时感到不自在。虽然法律规定所有项目对所有人员平等开放,但有些特殊项目的参与者仍然存在心理障碍。马景托什和卡尔顿(McIntosh and Charlton)<sup>[11]</sup>指出:体育参与的不平等必须深入研究,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平等,进而才能克服这种不平等。但这只是“不平等论”持有者在体育参与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出于人道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研究者们更为关注如何借助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从社会规范的重建层面,消除围绕体育参与方式长期积累下来的陈规陋习和阶层偏见,为各个社会阶层平等进入各个体育项目提供一个制度性的环境。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不平等论”成为一些公共社会学家和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学者们呼吁政府当局在体育大众教育、体育项目推广等领域实现改革时的有力武器。“不平等论”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当政以后,成为引导“第三条道路”式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并且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2 研究中国“体育参与”与“社会分层”的现实意义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之一,便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sup>[12]</sup>。我们从中国众多学者关于“体育参与”的实证研究结果中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体育参与的确和社会的层级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之间存在着关系。譬如,阶层不平等现象与体育参与方式在整个社会阶层间的两极化现象开始浮出水面,无论是体育人口、体育活动项目还是体育活动场所,各阶层间都存在很大差异。

于是,有学者提出“体育分层”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参与体育活动时或者不同的体育项目在被社会成员选择时由于种种因素产生了纵向差异,从而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和层次的过程和现象<sup>[13]</sup>。但是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论证。譬如体育参与的阶层特点、对于体育参与有何具体要求、与其他阶层之间有何差别等等,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遗憾的是,国内体育学界目前并未对这一体育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而上述5大理论对于深化今后的经验性研究无疑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进行“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之间关系的跨国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处于学者眼中的丁字型社会,即除了极少数处于上层的富裕者之外,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处在下层。对于体育参与而言,如何调动社会中

间阶层的积极性，通过形塑他们的体育参与方式，从而缓解、消除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无疑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经由改造人们的体育参与方式而实现社会平等，也是研究者的良好愿望。

### 参考文献：

- [1] Kenyon, Gerald S. Sport involvement: A conceptual go and some consequences thereof, in a spect of contemporary sport sociology[M]. Chicago: The Athletic Institute, 1969.
- [2]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New York: Mentor, 1953.
- [3] Gruneau R. Class,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3: 80.
- [4]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 Riesss S A. From pitch to putt: Sport and class in Anglo-americian sport[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1994(2): 144.

- [6] Hargreaves J. Sport and socialism in britain[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2(9): 131-153.
- [7] Holt R. Sport and the British: A modern hist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Hargreaves J.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ports in Britia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 [9] Jones S G Sport, politics and the working clas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0]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1] McIntosh P, Charlton V. The impact of sport for all policy(1966-1984)[M]. London: Sports Council, 1985.
- [12] 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 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3] 周进国. 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我国社会体育[J]. 体育学刊, 2007, 14(1): 138-140.

[编辑: 黄子响]

## 让我们重温顾拜旦的教导

刘翔因伤退赛的不幸消息,使全世界关心中国体育发展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惋惜,对于中国体育界更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从中央到普通老百姓,都纷纷表示慰问,甚至有人为他流泪。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刘翔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首先是来自全国人民期望的巨大压力,其次是广告商给他的压力,再其次是对手,如古巴小将罗伯斯的优异成绩给他带来的压力。这三重压力就像是“三座大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从这点看,他的伤痛不仅在脚上,而是在内心深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刘翔的东山再起只是一句空话。

北京奥运会又将出现多位优秀选手,或者说又将涌现一批竞技英雄,他们又将是企业追逐的对象。如果不好好爱护、保护他们,他们也将会昙花一现。近年来,企业请运动员代言广告已成惯例,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不会过多考虑运动员的光荣使命。运动员是国家的精英,国家为他们付出了许许多多。如果毁于一旦,这不仅是运动员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难以弥补的损失。运动员成绩的获得,要依靠长期的艰苦训练,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更需淡泊名利,专心致志。如果因为商业广告等因素而影响了训练,就是本末倒置。

奥林匹克运动有三大敌人:一是政治干预,二是兴奋剂,

三是过分商业化。利用运动员做广告就属于第三者。这一点早在1908年到1920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顾拜旦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给我们敲了警钟。如今,不妨重温他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政府宴会上的忠告:“确切地说,当物质文明——或像我喜欢称之为机械文明获得进步,使一切事物都变得美好的今天,某些有损于奥林匹克理想的不良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同年7月,他在《双周评论》杂志中写道:“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体育正处在广告和欺骗的危险境地。在我们的社会,一切努力都被视为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竞技体育也被举办公共展览的组织者们看作是一种商业性的获利手段。”1927年,他向全世界青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说:“在这个充满如此多的机会,但也遭受如此多的堕落危险的现代世界中,奥林匹克主义可以成为培养道德高尚和心灵纯洁以及锻炼身体耐力和力量的学校;但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继续把荣誉和公正无私的观念提高到你们臂力的水平。未来取决于你们!”我们读了这几段话,一定有所感慨。这些话是他在80年前说的,至今读起来仍然很亲切、很有现实意义。目前出现的问题,非常值得国内体育界深思和反省。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